

子女随迁、城市就学与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

徐 慧

[摘要] 如何促进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的认同是我们城市化进程中紧迫而重要的课题。本文研究了子女随迁以及子女城市就学如何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使用2011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我们发现与将子女留守老家的流动者相比,子女随迁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具体表现为,更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更关心所在城市的变化,更愿意融入这所城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子女随迁均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正影响,其中处于学龄阶段子女的随迁对农民工城市认同的效应尤为突出。作为进一步的机制探究,我们发现,与在农村老家相比,带子女,尤其是学龄阶段子女一起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会比在农村生活更幸福。我们的研究对提升农民工及其下一代对城市的认同感、农民工市民化以及城市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也对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改革方向提供重要借鉴。

[关键词] 农民工; 子女随迁; 城市就学; 城市认同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见证了大规模的国内劳动力大转移。随着越来越多的流动者暂时或长期定居在城市,流动人群已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能会超过当地人口,就像深圳市的情况一样。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流动人口已达2.44亿^①。在庞大的流动人群中,大部分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群体。大规模的农村劳动

[收稿日期] 2018-01-1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子女在外务工家庭迁移决策中的影响研究”(71503022)。

[作者简介] 徐慧,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电子邮箱地址: xuhui@bnu.edu.cn。

^① 统计局网站数据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力转移带来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是大量的儿童留守老家。据最新的2017年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如果以一方或双方父母外出务工为被认为子女是留守的话,完全留守状态的学生大约1000万左右,缺父留守约为1100万,缺母留守儿童约200万,三类留守儿童总数为2300万,占农村义务教育中小学生的58.1%。大量的农村家庭因流动而分离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有的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制约所致。城市户籍与相应的城市福利紧密相关,尤其是子女教育。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无法享受到均等的教育以及医疗保障等机会。将子女留守老家也因此是很多的农民工家庭无奈的选择。

无论如何,家庭分离,尤其是将子女留守老家,无论是对留守儿童本身,还是对作为农民工父母,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聚焦于家庭分离导致的留守儿童的福利影响,尤其是在教育、健康以及心理行为上(Chen等,2009;Lu,2012;Wen和Lin,2012;Xu和Xie,2015;Lee,2011;Meng和Yamauchi,2017)。只有少部分研究去关注家庭分离对在城市务工的父母产生的影响。王春超和张呈磊(2017)最新的关于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的影响的研究填补了这个领域的部分空白。他们发现子女随迁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希望进一步关注子女随迁,尤其是学龄阶段子女的随迁对农民工城市认同感的影响,并探究其背后的机制。我们认为融入和认同存在差异。融入更多地指个体在城市的生活状态,比如获得本地工作、户籍身份以及住房等城市生活的基本保障条件,以及与周围人群的关系等方面。作为主观评价的认同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意识和感受(王春光,2001),主要表现为个体怎么感受和看待周围的社会。农民工可以客观上融入一个城市,但并不一定能真正地发自内心地认同这个城市。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不同,其在城市中的劳动和生活的态度就不同,那些有较高城市认同的农民工会有更高的市民化意愿,能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价值,更主动地参与到城市化进程中来并积极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且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也将影响规模庞大的二代子女的城市认同问题。此外,已有研究发现子女因素对农民工在城市的务工决策有重要的影响。如Démurger和Xu(2015)的实证研究发现,有小学阶段子女的父母,为了增加供子女教育的资金,会延长在城市的打工时间。因此,在中国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关注子女因素如何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以及相应的决策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的目标是利用大规模的调查数据,实证探究农民工城市认同感的决定机制,尤其是检验子女因素如何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我们主要使用2011年国家卫计委在全国范围内所做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微观个体

数据,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的城市数据和住房价格数据作为控制变量,系统分析子女因素对农民工人群对城市认同感的影响。具体来讲,我们仔细研究了子女数量、子女年龄(学龄前与学龄阶段)以及子女性别分别对农民工城市认同感的影响。考虑到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进一步借助工具变量的方法加以控制。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与将子女留守老家的农民工相比,子女随迁极大地提升了农民工对所生活城市的认同感,表现为更喜欢这个城市,更关心城市的变化,也更愿意融入城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子女随迁的影响呈现出高度一致,尤其是处于学龄阶段子女的随迁对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认同感效应更为明显。作为进一步的机制探究,我们发现,有子女,尤其是有学龄阶段子女随迁的农民工感觉到城市生活比老家更幸福,从而有力地提升了对该居住城市的认同。

本文希望对相关研究作出以下几点贡献:第一,利用大规模涉及全国所有省份的流动农民工数据,对农民工的城市认同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第二,是第一个实证评估农民工的家庭安排以及细分子女教育情况及其对城市认同的影响。第三,探讨农民工城市认同感的机制,即子女效应对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述评。第三部分为数据以及实证方法。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述评

我们的研究主要基于两方面的文献:一是农民工的城市认同相关文献;二是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影响。

(一)农民工的城市认同

“认同”译自英文的“identity”一词。“identity”在英文中有多种含义,既包括客观的一些相似或相同特性,如相同的身份、相同的表现等,又包括心理认识上的一致性及由此形成的关系(王春光,2001)。根据蔡禾、曹志刚(2009)的研究,城市认同可以包括地方认同和身份认同。地方认同即农民工对其所生活的地点客观生活情境的主观认同,身份认同即他们对自我农民工身份的主观认知。结合以上两种定义,在本研究中,我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关注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具体来说表现在心理上认识的一致性,以及对其所生活地点的主观认同问题。

农民工从乡村进入城市,他们社会生活的场域发生了巨大的变换,从同质性的、情感性的传统乡土社会进入到异质性的、工具性的现代城市社会,

面临着一个重新建立自身“认同”的过程(蔡禾、曹志刚, 2009)。那么农民工的认同感到底受到何种因素影响?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农民工认同感进行了研究。如李春玲(2004)研究了社会阶层对认同的影响。王春光(2001)从年龄、受教育程度来谈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认同上的差异。李培林、张翼(2008)从职业、收入和教育程度来研究阶层认同。此外,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还会受城市居民在文化上的排斥的影响(李强, 1995), 导致外来人口在心理上有意地保持与城市居民的距离, 逐渐远离主流社会。还有学者从制度歧视、心理歧视的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制度歧视对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影响(丁宪浩, 2006; 张国胜, 2007)。

已有关于认同决定因素的文献主要从个体和制度特征上去分析农民工对城市认同的影响。然而, 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却鲜有提及。一方面可能是农民工群体中有很大大一部分是单身者, 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较小。然而, 更多的农民工群体是已婚且有子女的人群, 这些人群面临子女的教育问题, 因此, 从农村到城市以后, 对生活城市的认同必然也会与家庭以及子女教育因素相关。

(二) 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影响

1. 子女随迁与城市融入

与本研究较为接近的是王春超和张呈磊(2017)的论文。他们研究了家庭迁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感的影响。研究主要关注通过留城意愿、长期定居意愿以及城市身份认同。研究发现家庭迁移模式可以增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研究使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数据主要包含上海市(松江区)、苏州市、无锡市、武汉市、长沙市、西安市、泉州市和咸阳市等八个城市。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与王春超和张呈磊(2017)的研究不同, 我们使用的数据是涉及全国所有省份的调查数据, 样本量更具有全国代表性。我们的研究关注农民工对城市的真实感受, 也就是城市认同。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讲, 认同是更多地从内心出发的一种真切感受。许多研究往往将认同和融入混合起来使用。然而, 这两者有着重要的差异。首先, 认同城市并不一定融入城市。个体可以置身于城市之外, 但依然可以对城市充满积极的主观感受。其次, 融入可以分为客观融入和主观融入。客观融入包括客观条件满足基础上的融入, 比如在城市有安定的生活, 有本地户籍、工作以及住房等。满足这些条件的个体显然会有很多, 但并非一定从内心上认同这个城市。主观融入是一种心理体验。作为本地居民, 对所生活城市的融入感是自然的, 并不存在融入的心理障碍问题。融入更多地针对外来人口。因此, 外来人口主观感受到的融入感, 更多地从个体被本地居民“接受”的角

度去体会。融入问题因此是一种复杂的带着多种客观和非客观的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果。可以说,融入中很难区分开来哪些是真实的意愿,哪些是受环境被动影响的多种因素。与此相比,认同更为单纯和直接,也能更加真切地衡量农民工对城市的真实体会与感受。

2. 子女因素与农民工在城市的主观幸福度

农民工在城市的幸福感是决定农民工对城市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不少研究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的幸福度。Akay等(2012, 2014)使用2007年的RUMiC数据对相关问题做了研究。该数据涉及10个最大的人口流出与流入的省份。Akay等(2012)主要关注相对收入对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度的影响,发现参照人群有很大的关系:流动人群的福利受城市里其他流动者以及在家乡的工人的相对收入的负面影响(地位效应),但受当地城市居民收入的正面影响(信号效应)。Akay等(2014)研究了中国流动者的汇款行为与主观幸福度的关系,发现流动者通过汇款的方式可以获得主观福利的增加。他们也发现汇款行为背后的利他动机以及合同动机,其中利他动机更为主导。Knight和Gunatilaka(2010)的研究显示流动人口与农村以及城市的居民相比,具有较低的平均幸福度,相对收入地位以及收入预期是影响流动人口幸福度的重要因素。Jiang等(2012)研究了户籍身份对幸福度的影响,如果不平等是和户籍身份相关的话,不管自身的户籍状况,那些生活在中国城市的人们会感到不幸福。进一步,与本地居民相比,流动者对身份相关的不平等更为厌恶,因为他们属于弱势群体。

关于幸福度的不同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文献中,子女数量作为一个社会人口驱动因素,影响幸福度的效用函数(Becchetti等,2013)。Banchflower(2008)的文献回顾中提到,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跨度的幸福度研究的文献中,拥有子女都会降低父母的主观幸福度(或至少没有显著的影响)。对这个结果的一个解释是子女会给父母带来额外的物质成本,这些成本会降低父母的效用。

在中国国内人口流动的研究背景下,子女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父母福祉。通常的物质成本无疑是一个途径。尤其是对有学龄儿童的流动者来说:对于这类人群,子女的教育可以和物质成本密切相关,因为城市的教育体系对流动者子女存在很大的歧视。另一个途径是家庭安排制约,这可能会增加流动者父母的额外的非物质心理成本。流动人群的家庭分离现象较为普遍,如一方或双方在城市务工,而子女在乡下由祖父母及其亲戚加以看管。那些关心子女福祉、教育以及工作前景的利他性父母,很有可能会因为与子女分离而承受痛苦,并引起效用的损失,影响父母在城市生活的幸福度。反过来

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对于利他性父母,带子女,尤其是有学龄阶段子女一起到城市生活会增加其在该城市生活的满意度,从而从内心上增进对这所城市的认同。基于以上假设,下面我们将用大规模的数据来实证检验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子女影响机制。

三、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于2011年卫计委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该调查涉及31个省份,326个城市以及5850个社区或村庄。调查中的流动人口家庭是在城市居住超过1月且不拥有当地户籍的人群。总共调查的流动人口家庭为128000户,但是每户家庭中只有一位16—59岁之间的成员作为回答者回答问题。各省调查的户数从2000户到10000不等。其中在人口较少的省份,如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吉林的户数是2000户,而流动人口较多的广东省有10000户。该调查中的抽样技术是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技术。在所选取的5850个社区或村庄中,随机选取20户流动人口家庭。

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包括一系列涉及流动者在城市的社会参与和心理状况的问题。调查问及个体,对“我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我关注现在城市的变化”“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是否同意。回答者可以在以下三者中选择:“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在研究中,我们将这四类回答进一步分成两大类,其中汇报为“完全同意”为一类,剩下的三类回答为一类。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对以上三个问题一致回答为“完全同意”者作为一类,以明确区分城市的“完全认同”与“非完全认同”。对于农民工,我们限定在已婚且有子女的农民工群体。排除掉缺失变量所损失掉的样本,以及将样本限定在18岁及以上到59岁以内,最后总共使用样本为43875农民工。表1呈现了农民工的家庭安排与其城市认同的一个初步描述。结果显示与子女分离的农民工和子女随迁的农民工对城市认同的差异巨大。总体来讲,子女随迁的“完全认同”农民工要比子女留守的“完全认同”的农民工比重高出10%左右。这个规律对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子女都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与带学龄前子女到城市的农民工相比,带处于学龄阶段子女到城市的农民工群体中“完全认同”的比重要高出3%左右,说明带子女到城市就学对农民工群体对城市认同感的影响很大。

表1 随迁子女情况与农民工城市认同

城市认同程度	非完全认同(%)	完全认同(%)
无子女在城市	76.32	23.68
至少一个子女在城市	66.84	33.16
无学龄儿童在城市	75.58	24.42
至少一个学龄儿童在城市	65.48	34.52
无学龄前儿童在城市	77.42	22.58
至少一个学龄前儿童在城市	68.56	31.44
无男孩在城市	76.86	23.14
至少一个男孩在城市	67.33	32.67
无女孩在城市	76.20	23.80
至少一个女孩在城市	66.40	33.60

数据来源：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表2展现的是已婚且有子女的农民工以及分子女随迁情况的农民工的主要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我们界定的子女随迁农民工是指至少有一个子女随其生活在城市。首先，我们看到，在样本中，子女随迁的农民工数量要远远高于无子女随迁的农民工，也就是说，在已婚并且有子女的农民工当中，大约三分之二的农民工是有随迁子女与其共同生活在城市，而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无随迁子女一起生活在城市。同时，我们发现在大部分的指标上，子女随迁和无子女随迁这两类农民工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有随迁子女的男性比重较高(61%VS. 57%)。此外，在教育程度上，两类人群差异较大。有随迁子女的农民工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重要显著高于无随迁子女的农民工。96%子女随迁的农民工中，其配偶也随迁，显著高于无子女随迁的农民工，其配偶随迁率仅为65%。子女随迁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时间较无子女随迁的农民工平均高两年左右。此外，从流动方式来讲，子女随迁的农民工的市内跨县流动比重显著高于无子女随迁的农民工。有意思的是，子女随迁的农民工更多地从事自我经营，而无子女随迁的农民工更多地在城市从事被雇用的职业。子女随迁的农民工很大比重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而无子女随迁者此类比重较小。然而，从家庭收入来讲，子女随迁的农民工家庭平均个人月收入要先显著少于无子女随迁的农民工。

表2 描述性统计

	无随迁子女		有随迁子女		均值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差值	显著性
男性(=1)	0.572	0.495	0.612	0.487	-0.040	***
年龄(年)	33.62	6.012	33.89	5.882	-0.266	***
汉(=1)	0.955	0.206	0.950	0.218	0.005	**
小学及以下(=1)	0.159	0.366	0.158	0.365	0.001	
初中(=1)	0.655	0.475	0.641	0.480	0.014	**
高中(=1)	0.165	0.372	0.170	0.376	-0.005	
高中以上(=1)	0.0200	0.140	0.0303	0.171	-0.010	***
配偶随迁(=1)	0.651	0.477	0.960	0.197	-0.309	***
城市居住时间(年)	3.607	4.087	5.397	4.896	-1.789	***
当年回老家次数	1.858	1.873	1.954	1.963	-0.097	***
跨省流动(=1)	0.630	0.483	0.455	0.498	0.175	***
省内跨市流动(=1)	0.251	0.434	0.333	0.471	-0.082	***
市内跨县流动(=1)	0.119	0.323	0.212	0.408	-0.093	***
雇主(=1)	0.0645	0.246	0.0938	0.292	-0.029	***
自雇佣(=1)	0.311	0.463	0.488	0.500	-0.177	***
家庭工作(=1)	0.0140	0.117	0.0203	0.141	-0.006	***
雇员(=1)	0.611	0.488	0.398	0.490	0.213	***
家庭平均个人月收入(元)	2550	20.817	1511	10.097	1039	***
社区平均个人月收入(元)	2215	10.385	1784	5.805	432	***
城市拥有住房(=1)	0.0266	0.161	0.136	0.343	0.101	0.302
样本量	13881		29976		43857	

数据来源：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二)基本研究方法

我们将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与子女因素联系起来。根据以上假设，流动者个体的城市认同不仅取决于其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流动特征、城市职业与收入、城市与区域特征等因素，也取决于子女因素带来的影响。因此，我们构造以下计量模型来进行检验：

$$C_{ihd} = \alpha F_{ihd} + \beta X_{ihd} + \eta_h + \mu_d + \varepsilon_{ihd}$$

其中 C_{ihd} 是来自省 h ，现居住在省 d 的流动者个体 i 的城市认同感。将因变量认同感分为两类：完全认同和非完全认同。我们主要关心的参数是 α ，

这是估计不同家庭安排对城市认同度的边际效用。其中 F_{ihd} 包括子女与家庭安排的相关特征变量包括随迁子女数、随迁子女的年龄(学龄前和学龄阶段)、随迁子女性别。变量 X_{ihd} 包括一系列影响个体认同感的个体特征因素, 包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民族), 家庭特征(配偶是否随迁、子女数、家庭月人均收入、社区平均人均月收入、居住类型), 流动特征(跨省或省内流动、城市居住时间、年返乡次), 就业特征(就业类型), 以及城市特征(居住城市空气质量、人均 GDP、人口密度以及房价)。此外, 我们还添加了来源地省份虚拟变量(γ_i)以及目的地省份的虚拟变量(μ_d)以及误差项 ε_{ihd} 。我们使用 OLS 而不是 Probit 模型来进行估计, 主要考虑到使用 Probit 模型时由于虚拟变量太多, 存在多重共线性, 因此得不到全局最优解, 而 OLS 被证明是有效并能直接估计样本平均边际效应的方法(Cameron & Trivedi, 2005)。而且在理论上来说, OLS 回归估计的系数和 Probit 模型的边际效(marginal effects)的差别不大(Angrist & Pischke, 2008)。

(三)考虑内生性: 工具变量法

是否将子女带到城市和农民工对该城市的认同之间并不完全是外生的。一个很有可能的情况是, 农民工对该城市认同感更高, 也更愿意将子女带到该城市一起生活。另外, 我们也无法排除同时可能影响个体城市认同感以及家庭安排决策的不可观察到的其他因素。基于这些考虑, 我们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 并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我们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带子女随迁到该城市的农民工的比重。我们认为这样的比重越高, 农民工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也会越大。而这个比重对农民工对现居城市认同感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因此, 从理论上讲, 这个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四、子女随迁、城市就学与城市认同的经验分析结果

(一)子女随迁、城市就学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认同

表 3 报告了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认同感影响的 OLS 回归结果。回归 1 将子女数和随迁子女数放入被解释变量, 回归 2 构造了子女随迁的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回归 3 是根据子女的不同年龄阶段作为被解释变量, 回归 4 是将子女的不同性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上回归均控制了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流动特征、所在城市特征以及来源省与流入省的虚拟变量。在控制了以上潜在影响因素之后, 结果显示随迁子女数越多, 农民工的城市

认同感更强。即便至少有一个子女在城市一起生活,也会极大地增进农民工对本城市的认同感。进一步从子女的年龄看,无论是带学龄前儿童还是学龄阶段的子女到城市一起生活,也都显著地增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值得注意的是,虚拟变量随迁学龄阶段子女的系数较随迁学龄前子女的系数大,说明能带子女到城市就学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认同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从子女的性别看,结果也是一致。无论是带女孩还是带男孩到城市生活,都显著促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且影响程度相似,说明子女的性别并不是决定农民工城市认同感的决定因素。

(二)其他因素的影响

表3的研究结果表明是否有学龄儿童,以及学龄儿童是否随迁对农民工城市认同影响很大。此外其他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认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个体特征变量来看,相比于男性,女性对城市的认同感更强。相比于少数民族,汉族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更低。个体的教育水平越高,城市认同感越强。相比于小学学历的农民工,教育背景较好(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对城市认同显著较高。与没有配偶随迁的农民工相比,配偶随迁者对城市的认同感也显著更高。农民工的流动方式对城市认同感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与跨省流动以及省内跨市流动相比,本市内跨县流动更有可能对城市产生认同感。与我们的常识相符,个体在城市的居住时间越长,对城市的认同感越强。与此同时,我们发现随着个体返乡次数增多,其对本城市的认同感反而增加。我们认为这有可能是因为返乡较为频繁的个体更多地是近距离迁移者。与老家距离越近的城市,其文化传统等方面也更接近,农民工也因此更有可能从心理上接受这个城市,从而对该地方产生认同感(李强,1995)。此外,农民工在城市的人均收入越高,也更容易对城市产生认同感。但是,城市相对收入越高,却不能给农民工对该城市的认同感带来促进作用。城市相对收入与贫富差距有关系,如果相对收入越高,表明该城市的贫富差距越大,也因此无法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在城市拥有住房也将显著地提升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农民工的职业也是影响城市认同的重要因素。相比于从事家庭工作者,在城市从事自我经营的雇主对城市的认同感更强。

表3也呈现了城市层面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认同感的影响。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越高,在该城市生活的农民工认同感就越强。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还与城市的发展水平有关:城市的人均GDP越高,农民工越有可能认同城市。然而城市的人口密度却对认同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越低。

表 3 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认同感的估计：总样本回归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男性(=1)	-0.015*** (0.004)	-0.015*** (0.004)	-0.014*** (0.004)	-0.015*** (0.0045)
年龄(年)	-0.001 (0.003)	-0.001 (0.003)	-0.003 (0.004)	0.000 (0.003)
年龄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汉(=1)	-0.035*** (0.011)	-0.035*** (0.011)	-0.035*** (0.011)	-0.035*** (0.0110)
初中(=1)	-0.001 (0.006)	-0.001 (0.006)	-0.001 (0.006)	-0.002 (0.006)
高中(=1)	0.018** (0.008)	0.018** (0.008)	0.019** (0.008)	0.017** (0.008)
高中以上(=1)	0.030** (0.015)	0.029** (0.015)	0.032** (0.015)	0.028* (0.015)
配偶随迁(=1)	0.042*** (0.007)	0.039*** (0.007)	0.041*** (0.007)	0.041*** (0.007)
跨省流动(=1)	-0.018** (0.008)	-0.017** (0.008)	-0.017** (0.008)	-0.017** (0.008)
省内跨市流动(=1)	-0.012* (0.007)	-0.012* (0.007)	-0.012* (0.007)	-0.012* (0.007)
城市居住时间(年)	0.008*** (0.000)	0.008*** (0.000)	0.008*** (0.000)	0.008*** (0.000)
当年回老家次数	0.009*** (0.001)	0.009*** (0.001)	0.009*** (0.001)	0.009*** (0.001)
Log 家庭平均个人月收入	0.018*** (0.005)	0.017*** (0.005)	0.017*** (0.005)	0.017*** (0.005)
Log 社区平均个人月收入	0.003 (0.007)	0.004 (0.007)	0.004 (0.007)	0.004 (0.007)

续表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城市拥有住房(=1)	0.102*** (0.008)	0.102*** (0.008)	0.102*** (0.008)	0.102*** (0.008)
雇主(=1)	0.031* (0.018)	0.032* (0.018)	0.031* (0.018)	0.032* (0.018)
自雇佣(=1)	0.020 (0.016)	0.021 (0.016)	0.020 (0.016)	0.021 (0.016)
雇员(=1)	0.006 (0.016)	0.007 (0.016)	0.006 (0.016)	0.0067 (0.016)
Log 空气质量	0.061** (0.026)	0.061** (0.026)	0.061** (0.026)	0.060** (0.026)
Log 人均 GDP	0.028*** (0.007)	0.028*** (0.007)	0.028*** (0.007)	0.028*** (0.007)
Log 住房价格	0.016 (0.020)	0.015 (0.010)	0.016 (0.010)	0.016 (0.010)
Log 城市密度	-0.036*** (0.005)	-0.0360*** (0.005)	-0.036*** (0.005)	-0.036*** (0.005)
子女数	-0.022*** (0.005)	-0.001 (0.004)		
随迁子女数	0.036*** (0.004)			
至少有 1 孩随迁(=1)		0.048*** (0.006)		
有学龄儿童			-0.021** (0.009)	
有学龄前儿童(=1)			-0.025*** (0.008)	
学龄儿童随迁(=1)			0.045*** (0.006)	
学龄前儿童随迁(=1)			0.038*** (0.007)	

续表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有男孩(=1)				-0.039*** (0.008)
有女孩(=1)				-0.030*** (0.007)
男孩随迁(=1)				0.040*** (0.006)
女孩随迁(=1)				0.040*** (0.007)
常数项	-0.426** (0.184)	-0.444** (0.184)	-0.387** (0.186)	-0.425** (0.184)
样本量	43857	43857	43857	43857
AdjustedR ²	0.0618	0.0617	0.0618	0.0620

数据来源：2011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2011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 中国区域统计年鉴》。

注：括号为标准差，* $p < 0.10$ ，** $p < 0.05$ ，*** $p < 0.01$ 代表显著水平；所有的回归均控制了来源省和流入省固定效应。自变量对照组依次分别是：女性，少数民族，小学及以下，市内跨县流动，城市无自有住房，家庭工作者。

(三)内生性的处理

如上文所述，子女随迁与否并非外生于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因为认同感本身也能促进个体将子女带到城市一起生活。此外，也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因素共同影响农民工家庭安排决策和城市认同感。因此，如果不对以上内生性问题加以处理，简单的 OLS 估计量有可能有偏误。为此，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重新估计，并与之前的结论进行对比。表 4 分别展示了使用工具变量和不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回归 1 和回归 2 分别使用“随迁子女数”和虚拟变量“至少有 1 个子女随迁”作为内生变量进行估计。表 5 呈现了使用工具变量之后的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表 5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的 F 统计量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和随迁子女的决策是显著相关。也就说在本城市带子女随迁的农民工的比重越高，个体农民工带子女随迁到该城市的可能性越大。表 4 的结果显示，在使用工具变量回归后，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认同感依然具有显著的正作用。对比无工具变量和有

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新的估计系数比没有进行内生性处理之前要大很多。这也意味着，如果不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的话，我们得到的估计结果偏小，会低估住子女随迁对城市认同的影响。

表4 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影响估计：内生性处理

变量	回归 1		回归 2	
	OLS	IV	OLS	IV
随迁子女数	0.036*** (0.004)	0.575 (0.033)		
至少有 1 孩随迁(=1)			0.048*** (0.006)	0.437*** (0.024)
个体人口学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流动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流入城市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流入省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流出省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43857		43857	

数据来源：同表 3

注：同表 3

(四) 农民工对城市认同的子女效应的机制探讨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得出子女随迁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城市认同是一个纯主观的个体心理感受，表现为更喜欢这所城市，更关心这所城市的变化以及更愿意融入这所城市。这 3 个指标都与个体在该城市生活的满意度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个体在该城市生活幸福，那么个体更有可能喜欢这所城市，关心这所城市和自愿去融入到这所城市中。因此，作为机制探究，我们想实证检验一下带子女随迁到城市是否显著地提高了农民工在该城市生活的主观幸福感，从而使得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更高。2011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涉及流动者在城市生活的一个心理状况的问题，就是涉及个体的幸福感。该问题具体是：“与您的家乡相比(户籍注册地)，您在这个城市的幸福度怎么样?”。回答者可以在以下三者中选择：“难说”“不幸福”“基本一样”“更幸福”。为了有效地排除对自己感受属于模糊状态的农民工，我们只将回答为“更幸福”的个体归位一类，其余三个回答者为一类作为

二元对比分析。与表 3 一样，在保持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基础上，我们以子女随迁数量，至少有 1 子女随迁，不同年龄阶段的子女随迁，以及不同性别的子女随迁作为自变量，将幸福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四个 OLS 回归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结果显示，子女随迁能够显著地提高农民工个体在城市的幸福度，且不同性别和年龄阶段的子女随迁都产生了高度一致的影响结果。从影响程度来看，学龄阶段子女的随迁对农民工幸福度的影响更大。该结果恰好有利地解释子女教育保障对父母城市认同度影响的重要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将子女，尤其是学龄阶段子女到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确更加幸福，这也就解释为何有子女，尤其是有学龄阶段子女随迁的农民工对该城市的认同度也会更高。

表 6 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幸福感的估计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子女数	-0.034*** (0.0054)	0.006 (0.006)		
随迁子女数	0.068*** (0.004)			
至少有 1 孩随迁(=1)		0.094*** (0.006)		
有学龄儿童			-0.042*** (0.009)	
有学龄前儿童(=1)			-0.050*** (0.009)	
学龄儿童随迁(=1)			0.080*** (0.007)	
学龄前儿童随迁(=1)			0.078*** (0.008)	
有男孩(=1)				-0.046*** (0.008)
有女孩(=1)				-0.044*** (0.008)

续表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男孩随迁(=1)				0.071*** (0.007)
女孩随迁(=1)				0.079*** (0.007)
常数项	-0.142 (0.194)	-0.181 (0.194)	-0.100 (0.196)	-0.141 (0.194)
样本量	43857	43857	43857	43857
AdjustedR ²	-28981.3	-28983.6	-28989.7	-28984.7

数据来源：同表 3

注：控制变量与表 3 一致，其余注解同表 3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利用 2011 年国家卫计委在全国范围内所做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微观个体数据，实证探究了农民工城市认同感的决定机制，尤其重点检验了子女因素如何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研究发现，与将子女留守老家的农民工相比，子女随迁极大地提升了农民工发自内心地对所生活城市的认同感，表现为更喜欢这个城市，更关心城市的变化，也更愿意融入城市。分年龄的估计结果显示，学龄阶段子女的随迁对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影响更大。我们进一步借助工具变量的方法对内生性问题加以控制以后，子女效应的结果稳健且影响更大。我们的研究说明，子女随迁，尤其是将子女带到城市就学的农民工感觉到城市生活比老家更幸福，是农民工对该居住城市认同的一个重要心理影响机制。

关注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是我国城市化深入推进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的研究发现对如何推动城市社会和谐发展、提升居民的主观福利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根据我们的研究结论，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的家庭安排约束很大程度上受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的限制。城市公共服务是与户籍制度紧密挂钩。非本地注册户籍者往往很难真正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相关福利体的供给是和地方财政相关。地方政府只会向本地居民提供服务，流动者往往被排除

在外。这样的机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许多流动者，尤其是那些来自农村地区的流动者，往往被不公平对待，尤其是在子女入学、医疗以及社会保障上面。因此，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使其能切实有效地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学生活问题是公共政策应努力的方向。

第二，扩大教育供给。对于许多农民工来说，子女随迁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城市更好的教育资源。然而教育是稀缺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门槛限制，这对广大农民工来说即便有意愿将子女带来城市，也会因无力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而放弃这样的选择。因此，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资源的供给是关键。建议国家通过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多更好的城市教育机会，以此满足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对教育的需求。政府可以加大教育供给上的财政投入，也应该利用社会资源，比如鼓励兴办民办学校的方式来扩大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毫无疑问，城市的教育保障可以解决农民工群体带子女到城市的后顾之忧。

第三，提升城市建设。我们的研究发现，城市更好的环境，更低的人口密度，较低的贫富差距以及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因此，城市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农民工城市认同感的因素。作为城市发展的政策制定者，应长远考虑城市的发展，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让城市均衡发展。唯有如此，生活于此的居民才能真正地、发自内心地喜欢所生活的城市，成为城市生活的主角和城市发展的积极推动者。

[参考文献]

- 蔡禾、曹志刚，2009：《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珠三角的实证分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丁宪浩，2006：《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分析》，《财经科学》第10期。
- 李春玲，2004：《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
- 李培林、张翼，2008：《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第2期。
- 李强，1995：《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社会学研究》第4期。
- 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王春超、张呈磊，2017：《子女随迁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社会学研究》第2期。
- 张国胜，2007：《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研究》，《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第2期。
- Akay, A., O. Bargain and K. F. Zimmermann, 2012, "Relative Concerns of Rural-to-

- Urban Migrants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81(2): 421–441.
- Akay, A., C. Giuliotti, J. D. Robalino and K. F. Zimmermann, 2014, “Remittances and well-being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3(12): 517–546.
- Angrist, J. D. and J. S. Pischke, 2008,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cchetti, L., E. G. Ricca and A. Pelloni, 2013, “The Paradox of Children and Life Satisfac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1(3): 725–751.
- Blanchflower, D. G., 2008,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Well-being, IZA DP No. 3354.
- Cameron, A. C. and K. T. Pravin, 2005, *Micro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n, X., Q. Huang, S. Rozelle, Y. Shi and L. Zhang, 2009, “Effect of Migration on Children’s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51: 323–343.
- Démurger, S., H. Xu, 2015,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IZA Journal of Migration*, 4(10).
- Jiang, S., M. Lu and H. Sato, 2012, “Identity,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40(6): 1190–1200.
- Knight, J. and R. Gunatilaka, 2010, “Great Expectation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38(1): 113–124.
- Lu, Y., 2012, “Education of Children Left Behind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4: 328–341.
- Lee, M. H., 2011, “Migration and Children’s Welfare in China: The Schooling and Health of Children Left Behind”,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44(2): 165–182.
- Meng, X. and C. Yamauchi, 2017, “Children of Migrants: The Cumulative Impact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Health Outcomes in China”, *Demography*, 54(5): 1677–1714.
- Wen, M. and D. Lin, 2012, “Child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Children Left Behind by Their Migrant Parents and Children of Nonmigrant families”, *Child Development*, 83: 120–136.
- Xu, H. and Y. Xie, 2015, “The Causal Effects of Rural-to-urban Migration on Children’s Well-being in China”,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 502–519.

Migrant children, urban school enrollment and the city identity of rural-urban migrants

XU Hui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How to enhance the city identity of the large scale rural-urban migrants is the urgent and important question for the current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aking children to the city and the urban school enrollment of migrant children on the city identity of rural-urban migrants. Using the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migrant population in urban China 2011”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we find that comparing with the rural-urban migrants leaving children behind, living with children in the city could greatly improve their city identity. Specifically, rural-urban migrants tend to like more the current residential city, care more the changes of the city, and 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We vary the age and the gender of the migrant children and find the consistent and robust effects. In particular, we find an even strong effect from the migrant children at school age.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we find that rural-urban migrants with children living in the city, in particular with children at school age, report a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 of happiness comparing to their counterparts. Our study ha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 to improve the city identity of both the rural-urban migrants and their children in the city,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rural-urban migrants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s well as to suggest the policy orientation in reforming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education system.

Key words: rural-urban migrants, migrant children, urban school enrollment, city identity

(责任编辑: 杨娟 责任校对: 杨娟 孙志军)